

公民声音

校长带小学女生开房,恶魔从何而来?

□晴川(职员)

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就读六年级的小女生集体失踪,引起老师和家长极度恐慌,原来,该6名小学女生被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某鹏及万宁市一政府单位职员小忠带走开房,目前校长陈某鹏二人已经被警方刑拘。(本报今日A18版)

我向来不惮以最险恶用心猜度我们的灵魂工程师,总认为再差也不会丢掉人性的底线,但当6个孩子成了大人淫乐的工具,我知道,我错了!

在我眼里,学校就是个用心围成的花园,是孩子最好的庇护所。当学生最起码的安全都不能保证,学生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得不到有效保护,这是怎样的是非之地?

还有我们的老师。哪一个不是孩子心目中的那个天使?可正是天使,让她们走进痛苦的深渊!虽说每个人内心都驻扎着一个恶魔,当恶魔蠢蠢欲动,只要不是禽兽,就该有最起码的道德底

线,为何连最起码的人性都彻底泯灭了?作为曾经的教师,我感到深深悲哀。

而同样让我悲哀的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又在哪里?从严治教不是一天才说,这些败类披着教师的外衣,如此肆无忌惮,难道就没发现一丝蛛丝马迹?虽然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教师队伍中混进一两个人渣,或者由“天使”变人渣,不能全怪“有关部门”,但如果能够警钟常敲,用人明察,多一些责任意识,有多少这样的悲剧不能避免?试问:一校之长如此大模大样地带走6个女孩,一走几天,邪恶和戾气要积累多

少时日?这岂是可以通过严惩当事人就可以抵消得了的?所以,如果仅仅是给直接当事人以严惩,对那些负有监管责任的,却没有一个明确说法,其结果就是:滥杀一气到狼狽为奸成为常态。这不仅是教育的失败,也是法律的悲哀,更是对社会正义的颠覆。

笔者以为,对于教师这个特殊行业,就得从重从快判决!惟其如此,才能弥合孩子的不幸与无助,帮助孩子远离梦魇和恐惧,也是洗刷教师耻辱,还有一个纯洁美好的校园环境。让正义得到伸张,才是给社会、给家长的最好慰藉。

今日关注

刘铁男案又见情妇反腐

□吴杭民(媒体从业者)

据5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1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有作风问题。根据罗昌平的说法,他“曾接到刘铁男情妇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获得重要的初始信息”。

一名副部级的官员被查,当然是反腐的一大胜利,但细究、追溯本案的案发过程,我们会很无奈甚至狗血地发现,这个被誉为“官民互动”反腐模式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竟然还是肇始于大家耳熟能详的情妇反腐!

“情妇与刘铁男反目后曾受死亡威胁,向举报人提供关键信息”,如此的情节其实在以往很多腐败案件中都曾上演,而根据举报人、《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的说法,他“曾接到刘铁男情妇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获得重要的初始信息”。显然,在查办刘铁男案中,刘的情妇又担当了关键的角色。

不得不说,如今,我们的反

腐机构已是很健全,而相关的法律制度,更是在不断完善,但遗憾的是,在很多的腐败大案里,那些贪官的情妇、小三却不断成为反腐之神器。试问,有多少腐败案件都是因为情妇的举报和反水而致使贪官“原形毕露”?

如今,一大批问题官员、腐败分子的现形,总是那么出其不意、纯属意外。网络上不是有“贪官十大意外落马方式”吗?被“破烂王”“捡”出来的贪官、被算命先生“算”出来的贪官、被情妇举报出的贪官等五花八门。而由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显示,在去年被查处

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

更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刘铁男被公开举报后,国家能源局相关部门曾公开否认举报。人民日报发表微博评论称,这也要警醒: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为“家奴”,为个人背书?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再次审视我们的制度反腐、反腐制度。情妇反腐抑或是小偷反腐的风起云涌,很大程度上暴露出现今反腐制度的诸多缺陷和漏洞,更暴露了腐败预防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改进和修补。

媒体评说

新京报

安监局刚查完,怎就发生矿难

5月11日,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富集镇桃子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12日傍晚,事故导致28人遇难,8人重伤,10人轻伤。巧合的是,5月7日,也就是事故发生4天前,四川省安监局事故调查处处长王建国,曾带队检查指导泸县桃子沟煤矿瓦斯治理工作。国家安监总局昨日下午关于此次事故的调查分析,初步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桃子沟煤矿涉嫌非法组织生产,在未批区域违规设置多个作业点,在通风性差的条件下作业,导致瓦斯浓度增大,遇火爆炸”。显然,桃子沟煤矿存在的明显非法生产、瓦斯治理工作不到位等因素,早就已经存在。那么,公众有理由质疑四川省安监局的“检查”和“指导”工作,是不是存在“走过场”的可能。

人民日报

办公楼不应成为“最美风景”

县政府办公大楼比照美国白宫修建,市政广场建设规模赶超天安门广场,政府所属宾馆的内部装修极尽奢华……一些地方政府耗费高额公共财政资金,超标准盖豪华办公楼,耗巨资建高档招待所,高投入装修培训中心,一些政府性楼堂馆所规模宏大、装修豪华,甚至成了当地有名的标志性建筑,成了当地“最美风景”。豪华楼堂馆所建筑满足了某些人讲排场的一己私欲,却刺痛了百姓的心。因为,政府自身的开支多了,那么用于公众支出的自然就少了。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是满足自用,还是先用于公众服务项目建设和支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和效果大不相同。

北京晨报

食堂垃圾减少30%怎么算出来的

据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季度,该部机关会议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15次,下降43%;机关招待餐费27.4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89万元,降幅达15%;食堂厨余垃圾减少30%;燃气减少10%,每月减少300立方米。机关招待餐费同比减少15%,值得表扬。然而有网友提出疑问:“国土资源部连厨余垃圾减少了30%都能如此精确地算出来,如何算出来的?难道每天都拿秤称一下厨余垃圾?”再说了,厨余垃圾是有分类的,不可能是一个“堆”。这么说的话,每天垃圾增减多少,即便估堆测算都无可能,更不要说一年的垃圾量了。官方统计数字常被质疑有水分,而实际上,数字不准,或夸大或有意少报,甚至瞒报的情况,既不是新闻,也不是秘密。

光明日报

要用公开透明释疑“破格提拔”

近日,湖南耒阳一位市民向衡阳市政府办申请公开包括当地80后副市长王卿在内的5名耒阳副市长的简历,被告知到耒阳政府官网查询,结果发现网站只有上述5人的分工,并无简历。据悉,王卿的父亲曾任耒阳市长,在网络舆论中,这一背景被解读为王卿能提拔为副市长的主要原因。毋庸讳言,“破格提拔”已经有了一种污名化的趋势。成系列出现的负面事件培养了公众的心理定势:每一个火箭上升的年轻人,背后都有一位高权重的长辈;每一次破格提拔的组织程序,都附着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破格提拔”已经从一个光明正大的用词变成了一种影射,一种暗示,并和寻租、特权、腐败、“官二代”发生了某种勾连。

追求真相

“吃吃喝喝”嘲弄了谁

□郭立场(高校讲师)

中国铁建上周遭遇“天降横祸”,这家公司年报中出现的超8亿元“业务招待费”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实际上,中国铁建也许是被指摘的一群公司中费用控制相对较好的几家之一。在2012年的年报中,172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业务招待费”,共计133亿元。其中,招待费排名前十的均为国企,这十家上市公司去年用于吃吃喝喝的费用共计29.07亿元。其中,上海建工和葛洲坝的招待费超过年利润的11%。

(5月13日《新京报》)



在“业务招待费”这个名目背后,中国商业社会中拉关系的作用在数据中得以凸显。在会计科目中,“业务招待费”指的是企业为生产、经营合理需要而发生支付的应酬费用,包括企业经营产生的宴请、工作餐开支、赠送纪念品开支、参观开支以及由此带来

的交通费等,而企业的会议费、差旅费等往往是单列的。因此外界把这一费用归结为“吃吃喝喝”,迎来送往。无论参与者怀揣着怎样的态度,是积极或无奈,但是在这场“工作变吃饭”的大潮中,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和改变。

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社会

中,人们千方百计地迅速连接和扩张自己的“熟人社会”关系,这本身有其文化的底蕴和心理的民俗性,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迫切需要发展和变化,应当朝着更健康的方式前进,阻碍现代文明进程的“饭局社交”,必须在人们反复的实践中有所改进。依据中国当下的国情,最紧迫要做的,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应依据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加快职能转变,按“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推进政府各项改革,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不该去插手,也就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具体来讲,就是做到“四个分开”,即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分开,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分开,政府职能和事业单位职能分开,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分开。按照“四个分开”的原则,弄清什么是“有所为”和什么是“有所不为”什么叫“到位”和“越位”,才能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读者来信

多么希望小孩子就在家门口读书

□朱永杰(公务员)

小孩子读书就在家门口,这是最安全最快乐的事情。政府完全有责任有义务加大这方面的教育投入,实现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读书的愿望——我们曾经拥有过,可是今天这竟然成了我们的梦想。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农村老家表哥的儿子转眼间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六七年过去,小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他那个村庄原本有个小学,叫那庄小学。多年前,我印象里这所小学在全乡镇是个明星,主要原因是村里很支持,村风好,上学读书是大事。虽然位置在乡镇的边上,但是给周围村庄的印象深刻,那庄村人好幸福。

今天,一切大变。早上上班时分,我接到表侄子的电话,说孩子该上小学了,不想走几里地到邻村上学,原因是既然要接送读书,还不如到县城去读,即便花费大些,总还花得起。关键是需要找人托人托关系能进去才行。他听说县城的小学也是人为为患,非常难进。于是想到在

外面工作的表叔,看能不能说说满足他的愿望。

放下电话,我脑海中马上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时光。那时候,我还在家乡的小学教书。虽然对照“普九”标准,一些学校在图书、实验室等项目上移花接木有造假现象,但是毕竟瑕不掩瑜,“普九”充分调动了全民办教育的积极性,老百姓面对摊派,虽然不情愿,但一说是盖学校,也就紧紧裤腰带忍了过来。没几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最美的房子是学校”,成为一道风景,几乎是每个村庄都有学校或者教学点,家家户户的小孩子足不出村就可以到校读书。

可惜,这样的好光景没几年,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到来,随

着2亿多农民工的流动,乡村的孩子也在减少,多数是跟着父母流动,或者为了上好学开始择校读书。结果,地方政府开始了“撤点并校”的所谓改革,不管布局合不合理,大幅度裁减学校或者教学点,导致亿万孩子出村读书,近者三五里,远者数十里。

拯救乡村,拯救农村教育,不妨就从纠正“撤点并校”的改革做起。小孩子读书就在家门口,这是最安全最快乐的事情。政府完全有责任有义务加大这方面的教育投入,实现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读书的愿望——我们曾经拥有过,可是今天这竟然成了我们的梦想。

多么希望表侄子的孩子就在自己的村小学读书,拥有个轻松快乐幸福的童年啊!